

怀念

柳鸣九：最后能留下小石粒就是最大的幸事

□王 杨

2015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在京举办《柳鸣九文集》首发式，许渊冲、汝信、叶廷芳、金志平、罗新璋等译界“大佬”悉数出席。会上，时年81岁的柳鸣九先生的一头银发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面对包含文学理论批评、文学史、文化散文随笔、翻译四部分，收录他毕生主要作品约600万字的15卷文集，他自谦“只是浅水滩上一根很普通的芦苇”，“个体是脆弱的、速朽的，很多努力往往都是徒劳的，犹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若干年过去，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最后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若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

柳鸣九先生曾在多篇文章和不同场合以西西弗斯自喻，自我定位为“文化的搬运工”和“精神苦力者”。但他留下的，不是平平无奇的小石子，更多的是在当时“激起千层浪”，而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至今仍闪烁着璀璨光芒的文化硕果。

不负父亲期待成为“读书人”

柳鸣九的名字来自于他出生时的体重。1934年农历二月初四，在南京做厨师的柳家诞生了一个“九斤子”，在父母的拜托下，隔壁老先生据此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为他取名柳鸣九。在回忆录中，柳鸣九先生曾笑称：“此名甚为张扬，大有‘个人英雄主义’气概”，认为自己颇有点好名的个性，与此名字不无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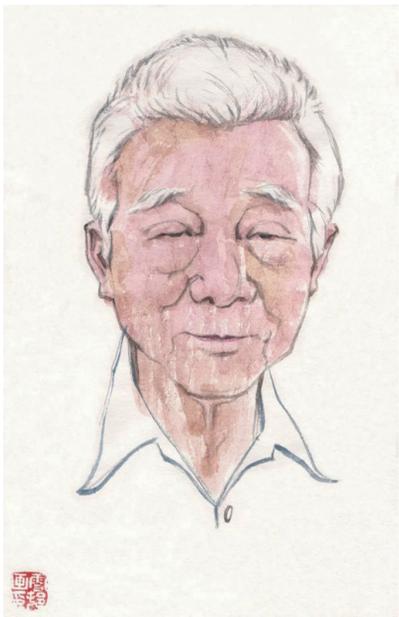
出生于民族灾难深重之际，柳鸣九童年少不了逃难奔波。一家曾偏安湖南耒阳三四年，后随着日军进犯，不得不前往桂林避难，从桂林仓皇出逃，经贵阳，花了不止一根金条才到了陪都重庆，在重庆市内一个十几平米半悬空的房子栖身。

来阳时期，幼年柳鸣九仅有的文化活法是遵照父亲的指示每天练习毛笔字——做厨师的父亲对孩子唯一期待是“成为读书人”。直到在重庆念到小学五六年级，柳鸣九开始阅读课外书，跑书店，他感觉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心灵，寻找到了新的世界，“其作用在某些方面并不亚于我大学期间所受到的科班教育与严格的业务训练”。

抗战胜利后，随着父亲工作迁徙和全国解放，柳鸣九先后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中学、长沙广益中学、重庆求精中学、长沙省立一中，在中学时期开眼界、长见识，接触到英文和外国文学，自办了两期油印文艺刊物《劲草》，也受到严省愚、彭靖等有文化理想的师长的熏陶。在长沙省立一中时，还曾因为迟迟不能入团的问题，经受了一番思想上的煎熬和磨炼。

1953年，柳鸣九如愿考上北京大学西语系，正好赶上了“北大最好的时期”，院系调整后，教育理念和制度更加规范成熟，课程设置合理，优秀学者云集，西语系由冯至先生主持，吴达元、李慰慈、李锡钰、郭麟阁、陈占元、盛澄华、李赋宁、闻家骅等曾为他们讲授语音、语法、精读、西方文学史等课程；他还聆听过王瑶、杨伯峻、田余庆等先生的文史课。此外，50年代后期，他在大学校园经历了不寻常的政治运动，经历了思想上的淬炼和蜕变。对柳鸣九来说，这是“塑造成型的北大四年”，在此期间，他立下做一名学者或文化工作者的明确志向。1957年夏，他被分配到当时隶属于北京大学、后归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文学研究所，“第一站”到了蔡仪任主任的文艺理论研究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是具有一定开放性和先锋性的刊物，专门介绍西方各国古典文艺理论名篇，编委包括蔡仪、朱光潜、钱锺书、李健吾、卞之琳、杨周翰、季羨林、金克木、冯至、田德望等西学学者。刚毕业的柳鸣九被安排负责编务、外联和译稿相关的事务，经常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杂志社所在的中关村和众多学者所居的燕园，每次都能增长见识，不啻为一次“业务进修”。他逐渐参与到译稿审核、翻译以及撰写评论文章等工作中，并被定为实习研究员，进入到文艺研究所系列，主要方向是西方文艺批评史。在文艺理论室的六年中，柳鸣九还曾在60年代初人民大学与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文学研究班任助教；参与了周扬主持的高等院校文



柳鸣九先生画像 罗雪村 绘



柳鸣九先生书房速写 罗雪村 绘

科教材编写工程中《文学概论》的编写；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批评“人性论”的讨论中，他曾就共鸣与人性的关系问题撰写文章——一晚，他认为自己最初在人性和共鸣关系问题上“左”的机械论毛病，但对阅读活动中各种情感活动形式的论述，“至少仍不失为实事求是之言”，是“比较深入细致的科学论述”。

“逆反情绪”下编写《法国文学史》

作为一个小小的西西弗斯，柳鸣九先生在学术生涯中所推动第一块大石就是法国文学史研究。在文研所初期定下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研究方向后，柳鸣九在文学思潮史、文学史以及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为之后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4年，原有的西方文学室、苏联文学室、东欧文学室、东方文学室以及世界文学编辑部等从文学研究所分出去，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冯至任所长。柳鸣九申请从文学研究所调入外文所。因为志趣上更偏重于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加之认为自己的感受力、敏锐性和通感力略强于逻辑思维和分析，他希望在外文所先潜心研究文学史，再进行理论的阐发和建构。1965年7月，根据周扬的指示，外文所要编写《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任务落到柳鸣九所在的西方文学室。室主任卞之琳按照“集体任务由年轻人去完成”的老规矩，组成了有张黎、吕同六、郑克鲁、张英伦、朱虹、董衡巽，以及包括袁可嘉、郑敏等“中年人”在内的编写组，编写组的学术秘书就是柳鸣九。



柳鸣九部分著作和翻译作品

外面颇有“山雨欲来”之势。书斋里面，柳鸣九凭着之前在理论室对西方文学的功底操持起“学术秘书”的工作：编写组成员共同努力，在三个月内拿出了五六万字的《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提纲。在此基础上细化阐述、丰富内容，文学史已遥遥在望之时，“文革”开始了。

1976年文革结束时，柳鸣九已经42岁。文革后期的1972年，在河南干校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人员回到北京。运动中深感疲惫不堪的柳鸣九为寻求一个现实的避难所，与老友郑克鲁、张英伦、金志平商量后，打算编写一部法国文学史。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过一本苏联编选的《法国文学简史》，柳鸣九想编一部中国人自己的法国文学史。他认为，以编者的知识积累、学识、视野，在规模和丰富性上超过苏联的小册子“蛮有把握”。1976年，中世纪到18世纪的部分基本完成时，已经达到一卷的体量，编写目标遂由原来的一本书扩展到三卷。1979年，《法国文学史》上卷出版。进入新时期后，正常的学术和业务工作恢复，后两卷编写时间相应拉长，与此同时也有更多学者加入到编写工作中，直到1991年三卷本全部出版完成。

柳鸣九认同写作文学史如同提供旅游指南的看法，认为应尽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为对象提供尽可能完备的说明；他同时也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理论强势的时代”，特别是文学史写作不能仅停留在资料堆砌上，需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法国文学史》上卷出版后，李健吾称这是“作者为法国人在法国文学史上出了一条路”；学者钱锺书在阅读了中卷概论部分后认为“叙述扼要，文笔清楚朴实”。

因为亲身经历文革所造成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压抑，柳鸣九先生后来回忆说，编写这套文学史时，颇有些自觉的“逆反情绪”，要打破意识形态领域的禁锢，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感的立场指导编写，但“并没有走得太过”。进入新世纪后，有感于该书的时代局限性，柳鸣九花两年多时间对该书做了修订，特别是改写了第一卷中有关蒙田、拉伯雷等16世纪文学的部分内容。2007年，修订版《法国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柳

鸣九先生为修订版撰写的长篇序言《关于〈法国文学史〉的修订》发表在2007年第5期《南方文坛》。在文章中，他反思了文学史中过于把文学发展过程与社会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等方面的时代局限性，但对“《法国文学史》的观点过时了”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思想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具有特殊性，对于作家作品，宜将“阶级分析方法与心理分析方法、艺术分析方法综合施用”，而不应简单机械加以判断。

“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假如用一句话来评价柳鸣九先生——他是我国法语文学研究翻译界的一面旗帜，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翻译家余中先眼中的柳鸣九先生“个子不高却很有湖南人的冲劲儿”，“性格上敢为人先，大家不说的话他就出来了”，是个“能量很大的人”。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推动思想解放形成滚滚大潮。柳鸣九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鼓起了学术上大有作为的信心，他将目标瞄准西方20世纪文学，从认为西方现当代文学是衰颓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日丹诺夫论断”入手，对其进行重新评价。恰好当年10月，由社科院外文所承办的全国第一次外国文学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同时将借此成立全国性的外国文学学会，时任所长冯至让柳鸣九作重点学术发言。这场会议主办和协办单位阵容强大，周扬、姜椿芳、梅益、朱光潜、季羨林、金克木、冯至、梁宗岱、草婴、楼适夷等文化界、译界人士云集。时年44岁的柳鸣九在大会作了题为《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从对20世纪西方文学艺术的社会性质、意义和作用的分析，西方现当代文学的思想内容和思想基础，如何看待西方现当代文学的艺术性，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评价西方现当代文艺等几个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为20世纪西方现当代文学“讲公道话”。

1979年，柳鸣九开始着手编选《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进一步让事实说话”，将20世纪法国文学的典型现象展示清楚。鉴于萨特



在20世纪法国文化领域的地位，柳鸣九选择《萨特研究》作为丛刊的第一辑，相较于创作技艺，他更重视萨特在哲学文化领域的贡献和文学上的思想性。柳鸣九对《萨特研究》的栏目和内容做了设计，以萨特文学作品翻译、叙事性作品编译和理论译介作为主体，补充了作家与批评家论萨特、萨特戏剧创作背景以及生平与创作年表等相关资料，并亲自撰写了长篇序言。需要指出的是，《萨特研究》也是由多位优秀法语学者合作完成的一项学术成果，李恒基、罗新璋、谭立德承担了《间隔》《萨特年表》《苍蝇》的翻译，施康强则翻译了两篇重要论文《七十岁自画像》《为什么写作》等，这也体现了柳鸣九先生出色的学术策划和组织能力。

“为了一个人文的书架”

柳鸣九先生主持编选的文集、书系、丛书等项目近二十种，若分卷罗列，条目可达几百。他曾坦言，自己的编选量大大超过了论著量，“有悖于学林中厚积薄发的理念与标准”。而之所以对编选情有独钟，源于柳鸣九先生“为了一个人文的书架”的人生追求和为社会文化积累添砖加瓦的人生理想。他曾在回忆录中表示，自己信仰优秀的文化和有精神价值的书架，痛感当今社会人文精神的滑落、优质文化的贬值，想对文化、对人文精神的积累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这种追求和理想直至晚年而不衰，更支撑他“担当了辛劳，承受了打击，度过了我个人生活中的沟沟坎坎”。他有两个六层大书柜，每有他撰写、翻译、编选的新书问世，他都习惯将其“入库”，自称这是“陋室”中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坐在对面的沙发上，面对书柜，如在“家园”和“加油站”，几百本书展示出的过程和成果，也昭示着存在和意义。

2018年11月19日，柳鸣九等7位翻译家荣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如今，一同获奖的阿拉伯语翻译家仲晓昆、波兰语翻译家易丽君也已经离开了我们。柳鸣九先生曾把从事西学研究的人文传播的思想者、学者视为“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甚至以“盗火者”为10位外国文学学者的散文文丛命名。他认为自己也是一名“盗火者”，对社会人生的审视和对人文主义的向往，是中国社会现实的火种，愿意为此付出“精神的苦力”。他曾表示，“我很高兴自己的一生是不断劳作的一生”，“我劳故我在”，且这种劳动是具有创造性、独特性和突破性的，为社会文化的积累增添了砖瓦。他的思想和文字极具锋芒，著译等身，但仍以真实、实在的立场直面自身，自称“凡夫俗子”、学林中的“矮个子”，将一生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归结为自己“蚂蚁式的勤奋”，坦言“勤奋”二字恰巧是对自己治学经历最基本、最具体、最确切的概括与总结，“这个评价也算是最硬得颠扑不破，谁都认可的，就像算术中的最大公约数”。

（编者按：2022年12月15日，翻译家、学者柳鸣九先生逝世，享年88岁。本报特刊此文，以示缅怀。）

中西诗歌传播的一次探索

□[西班牙]萨尔瓦多·巴拉 宋兵

对于欧洲人来说非常困难。中国历史上，尽管经历了许多朝代更迭以及战争，但中国的文字传统依然完好。中国传统文化基于众多睿智的哲学家的思想以及智慧和教义，如孔子（儒家）和老子（道教）的智慧，他们影响和教育着人类的知识及美德。近三年，俳句比赛的参与者水平比较高。由于语言和文化不同，翻译对我们而言十分困难。因此，俳句赛事活动的举办并不容易，好的愿景与坚持不懈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宋兵：您阅读过中国当代文学吗？对此您能谈谈印象及感受吗？
萨尔瓦多·巴拉：无论是在艺术、文学、音乐还是哲学方面，中国的古典作品都令人钦佩。而现如今要找到能脱颖而出、当代文学并非易事。在我看来，日本及东方文学领域也是如此，经典文学书籍更吸引我。

宋兵：是否可以谈谈您组织此赛事的目的和初衷？
萨尔瓦多·巴拉：我们谦卑地参与文化世界中，其中包括对诗歌的传播，这是一种接近文学、

崇尚美德的文化模式。我们所举办的活动还倡导一种文化模式，推动人类在和平的环境中以人文的形式交流、成长，这也是一种尊重自然、生态和正义模式。

宋兵：您能谈谈中国文学作品在西班牙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吗？
萨尔瓦多·巴拉：首先，我们不应忘掉翻译的重要作用，以及东、西方语言不同所带来的理解困难。以诗歌为例，中国诗歌有一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也充满着吸引力，在汉语中，每个单词没有预定义的语法类别。翻译这些文本的工作通常是真正的语言专家或知识分子来担当。然而，由于大量缺乏具有这样文化素养的专业翻译人员，翻译工作变得相当复杂。应该强调的是，译者不仅要掌握语言与翻译艺术，还必须是了解其文化和文学的伟大鉴赏家。

宋兵：您能给我们讲一些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故事或轶事吗？
萨尔瓦多·巴拉：在巴塞罗那和西班牙的其他

重要城市，新年的庆祝活动是与农历新年相关的，此外，中国文化相关的文化协会还会举行一些游行活动。在我们国家也有人关注中国武术、着装和音乐。我们一些当地人还知道《易经》并对此进行有关星运等方面的咨询，这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作品。在中国龙的形象和象征意义（日本的与其相似，不过与欧洲龙的形象具有不同的含义）方面，也已经被西班牙众多社区所接受。

宋兵：您能就中、西两国文学/诗歌等文化交流与合作提出一些建议和展望吗？
萨尔瓦多·巴拉：我建议能够对西班牙那些了解并传播中国文化的实体机构进行宣传和帮扶，如可以通过与大使馆、大学及市政厅等机构来交流和传播两国文学、旅游等诸多领域，与传播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民间组织及个人建立深厚的友情也至关重要。

（萨尔瓦多·巴拉系巴塞罗那格罗·米罗文学奖委员会主席；宋兵系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副教授）



西班牙俳句团体诗大赛格罗·米罗文学奖评委会成员，左二为萨尔瓦多·巴拉先生

宋兵：首先，非常感谢您组织俳句体诗（Haiku）创作和翻译赛事，也感谢阿尔巴·费尔南德斯·托雷斯老师为我校（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提供的参赛的机会。您对本次学生的参赛译作有何评价？您如何看待日本俳句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

萨尔瓦多·巴拉：在谈论日本俳句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关系和异同之前，有必要对中日两国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相互的影响作探寻和分析。日本文字是来源于中国的汉字。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影响着日本。中国文化一直具有自身的先进性，如瓷器、火药和庄重的建筑。就语言而言，这种古老的文字有一个独特的带有象征字符的书写系统，这种语言文字的应用